



山西工人多壮志 抗日劲旅扬威名

“苏联有个工人师，中国有个工卫旅。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贺龙赞誉的工卫旅，正是在中共山西省工委和太原市委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工人武装，抗日战争中赫赫有名的工人武装自卫队（后称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旅）。抗战期间，太原市产业工人响应中共山西省委“武装山西工人，坚持山西抗战”的号召，挺身而出，拿起武器，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太原失守后，他们像一把尖刀紧紧插在敌人胸口，在文水、交城、汾阳等地，与留在太原的工人和群众紧密呼应，配合八路军打击日寇，在斗争中锻炼出一支钢铁队伍。

太原工人抗日热潮的兴起

1936年，面对日寇对华北的疯狂进攻，山西民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

是年秋天，党派康永和同志到西北毛织厂开展工作，该厂当时只有一个党员（田恒同志）。康永和去后，党组织活动慢慢开展起来，并成立了党支部。不久，钢厂、炮厂、冲锋枪厂、晋生纺织厂、晋华卷烟厂都相继建立了党支部。西安事变后，党组织活动由秘密转入半公开状态，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通过工会组织，在工人中广泛开展救亡运动，在多个厂区成立了工人夜校、识字班、俱乐部、话剧团，教工人识字，组织工人开展文娱活动，团结教育工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八路军的游击战术。

随着工人抗日救国的热情越来越高，193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一万多工人在海子边隆重举行纪念大会。大家满怀激情地高唱《工人之歌》和《五月的鲜花》等歌曲，会后还在国民师范举行了工人演讲会，演出了话剧等。

“五一”以后，工人们提出了“吃饱饭，好抗日”的口号，反对厂方无故延长工时、降低薪酬。晋华卷烟厂的工人们首先举行罢工，西北实业公司勾结宪兵队进行镇压，逮捕了王长秀等两名领头的女工。消息传开后，全市工人奋起声援，终于迫使资方释放了被捕工人，并答应不减工资。与此同时，西北实业公司所属各厂工人群众反对当权者限制工人参加牺盟会的斗争也取得胜利，由此，工人们获得参加牺盟会的合法权利。

山西省总工会和工卫队的建立

七七事变后不久，刘少奇同志和北方局负责同志先后来到太原，加强对太原工作的领导，太原工人运动有了更大的发展。当月，时任中共太原市委书记的赵林同志向地下党组织传达了北方局关于武装群众起来抗日的指示，以及省委提出的“武装山西工人，坚持山西抗战”的口号。根据这些指示，市委决定要把组织一支工人阶级的抗日队伍作为当时太原党组织的一项中心任务。此后不久，北方局

决定由杨尚昆、林枫（当时叫罗鸿）、赵林、康永和四人组成高级党团，专门负责组织山西工人抗日武装工作。

随着工人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涨，1937年8月中旬，党组织决定成立山西省总工会，以便进一步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人武装抗日。各厂党的地下组织通过牺盟会，举行全市大规模的“九一八”国耻纪念会，正式成立总工会，并号召工人群众起来抗战，建立一支工人抗日武装。

纪念会定于9月18日下午4时在海子边召开。太原小北门外各厂的工人群众决定下午3时在西北制造厂门前的空场地上集合，然后集体列队前往会场。下午3时许，毛织厂的工人准备出发时，厂警堵在厂门口阻止工人们出厂，但工人们每人拿了一根四五尺长染色用的木棍，集合队伍浩浩荡荡冲出厂门。毛织厂的工人们赶到集合场地后，听说兵工厂的工人被军警堵在厂里，便立即高呼口号，一起冲向兵工厂厂门口。经过内外合力，兵工厂大铁门被冲开，兵工厂的工人像潮水一般涌了出来，同毛织厂和其他厂的工人们会合一处，列队浩浩荡荡向海子边开去。

下午4时左右，大会正式开始。会场上人山人海，歌声、口号声响成一片，充分显示出太原工人阶级和群众誓死抗战到底的决心。会上，牺盟会负责同志和八路军将领萧克同志，以及工人代表登台讲话。大会一直开到晚上11时。会后，工人队伍在毛织厂和其他工厂纠察队的保护下开始了大游行。队伍行进到省政府门前停了下来，向阎锡山提出了发给工人武器、答应工人武装起来抗日的要求。经过交涉，阎锡山答应发给工人冲锋枪500支、步枪2500支。在这一胜利的鼓舞下，游行队伍又涌向西北公司，要求公司发放拖欠工人们的工资、红利等，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之下，经理彭士弘当场写下了发给工人红利的保证书。

当天深夜，工人们又涌向小北门小校场召开大会，会上提出成立山西省总工会的建议，得到与会3万多名工人的一致通过，并当场选举康永和为省总工会主席，选举马真、张兴业、许宏文、赵华清等11人为常委。省总工会成立后，各厂又先后成立了25个分会，工人们从此有了自己的组织，进一步接受了革命教育，为下一步组织工人自己的武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月初，娘子关失守，忻口吃紧，日寇节节逼近太原。工人们经过多次斗争的锻炼，觉悟更加提高，要求抗日的情绪空前高涨，发出了“要求抗战，反对投降、逃跑”的呼声，工人武装自卫队（简称工卫队）就在这种形势下诞生了。这支队伍由于有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和工会组织的发动，一个多月时间，全太原就有近千名工人参加了工卫队，走上了武装抗日的革命道路。

主动打击敌人 工卫队大显神威

1938年1月，日寇开始向同蒲南段和晋西大举进攻，驻守在中阳县整训的工卫队，便暴露在前线。一天，工卫队一大队300多人向离石九里湾三角村一带转移中，与一个旅团的鬼子遭遇。工卫队战士们顾不上敌众我寡和选择地势，立即投入了战斗。战斗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打到晚上8点多钟。这场战斗中，工卫队战士用自己的身体和鲜血，抗击了数千敌人的进攻，使日寇两天不能前进一步。日寇经过这次打击，再也不敢冒进，以后一听到工卫队的名字，便心生忌惮。

1938年上半年，工卫队深入晋中平川建立抗日政权后，对晋中各县的敌人形成严重威胁。为此，一些县里的日寇不断出来“扫荡”，企图消灭工卫队。一天拂晓，300多名日寇包围了工卫队的驻地——文水南沟村，企图围歼工卫队。可是，他们打错了算盘，工卫队早就得到情报，和全村群众一起安全转移到山上去了。日寇走到南沟村附近的沿子河时，遭到早已埋伏在河岸土崖上的工卫队员伏击。这场战斗全歼300多名日寇，我方无一伤亡，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1938年8月，工卫队开到文水、交城一带开辟敌后根据地。当时，部队在枪支、弹药、供给等各方面都遇到了困难，特别是被服奇缺。工卫队领导经过研究，决定袭击祁县敌织布厂（时称益晋公司）。

工卫队一大队第五中队接到任务后，先从祁县城里抓来两个汉奸，摸清了敌人的活动规律。9月11日天黑后，部队向祁县城关逼近，直奔益晋公司。该公司里驻有一小队日寇，晚上有些寒冷，日军哨兵缩在岗楼里，打着哈欠正等着换岗，突然从门前的河沟里跃出一名工卫队战士，直扑岗楼，哨兵未及反应，一把刺刀已插进他的胸膛。这时，临街排房里的日军士兵还在蒙头睡觉，没等从被窝里爬出来，就被工卫队战士们用刺刀全部消灭。工卫队的运输队伍打开仓库，整整装了40马车白布，趁天未亮全部拉走。战士们看到一车车的布匹，欢喜不已，一名战士在撤离前，还拿出一块手绢，蘸着日寇的鲜血在墙上写下四句话：“叫声鬼子听我说，以后可别再封锁；有布趁早送过来，省了挨刀怪难活。”这次奇袭益晋公司，工卫队一枪未放，亦无一伤亡。

工卫队主动出击半年以来，到1939年春，文水、交城、

汾阳县城以外的敌人据点，几乎全被拔掉。

建抗日根据地 结军民鱼水情

工卫队在文水、交城、汾阳一带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工作的过程中，与广大农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赢得了农民群众的信赖。当地农民群众一提起工卫队就说：“这些工人队伍都是好样的，有了他们，鬼子就不愁消灭。他们和中央军不是一路。”一天晚上，工卫队的一个营奉命到文水北胡家堡开辟工作。队伍急速行进到靠近北胡家堡村的时候，村子里突然响起了枪声，子弹向工卫队方向射来。队员们很快意识到是村里的农民自卫队发生了误会。顾永田同志便大声喊道：“自卫队同志们，不要打枪了，我们是工卫队，是来打鬼子的。”然后，派了两个代表进村里去联系，过了不多一会儿，隐约看见黑压压的一群人从村里涌了出来，直向工卫队的方向奔来，拉上工卫队的同志就往村里走。村里人知道了工卫队是打鬼子的工人队伍，都想让英雄们住到自己家里，慰劳一番。这一夜，北胡家堡村可热闹了，老乡们又是烧水，又是炒菜、做饭，忙个不停。工卫队驻进北胡家堡村后，给老乡们担水、扫院、碾米、犁地、修房等，亲如一家。许多农民自卫队员还带上自己的武器，参加了工卫队，壮大了工人武装的力量。

坚持工卫旅建制 开展反顽固斗争

1939年5月，阎锡山把工卫队改编为第二战区独立207旅，下编21团、22团、23团三个团，郭挺一为旅长。工卫队的战士们不肯承认207旅番号，便自制臂章，改称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旅，工卫旅这光荣的名称便从此开始。

这一年12月，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政变，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挥舞屠刀，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配合日寇向晋西南、晋东南的抗日武装力量进攻，企图将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一举消灭。然而，工卫旅不但没有被打散，反而更加集中起来，并宣告正式脱离阎锡山军队的编制，扣捕叛徒，拔掉了阎锡山安插在工人队伍中的“钉子”，与抗日决死四纵队配合，参加了晋西北的讨逆作战。12月中旬，工卫旅又进军兴县、临县地区，奋战月余。在临县战役中，工卫旅炮兵大显神威，受到嘉奖。

1940年春，工卫旅21团、23团由晋中移防晋西北，在晋绥边区与八路军120师会师。在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工卫旅开始了整军，加强了部队正规化建设，并增加了300名官兵。从此，这支工人队伍更加壮大，呈现出崭新的军貌。

艰苦卓绝战斗 粉碎日寇“扫荡”

1940年冬，敌人向我晋绥边区的大门——八分区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驻守文水、交城一带的工卫旅21团奉命组织当地群众空室清野，准备迎击敌人。部队化整为零撤进高山，机动灵活，打击敌人。彭嘉诗团长率领的营撤到逯沟山后，接到侦察排的报告，称“敌人已由东社一带经东胡芦川的冯庄向西进，当天拂晓由冯庄出动，看样子要到西治川与西路军会合”。逯沟山是东胡芦川通向西治川的必经之路，这条路的两侧悬崖峭壁，只要在山上的关口摆放一挺机枪，不管有多少敌人也无法通过，是一处伏击敌人的绝佳战场。彭嘉诗团长当即命令：一连在正面监视敌人，二连、三连埋伏在路两侧的悬崖上，严阵以待。当大队日军进入逯沟山前东坡底村的时候，各连已作好了战斗准备。狡猾的敌人先用两门山炮向一连正面阵地轰击，接着由东坡底向山上硬冲，可是还没接近石阶，就被一连的火力压住，紧接着，二连、三连在两侧的山顶上猛向沟底投掷手榴弹，打得日寇丢下大片尸体，撤回原地。日寇不甘失败，连续组织了15次冲锋，最终还是未能前进一步。这场战斗从上午10时开始一直打到天黑，日寇在山坡上丢下了800多具尸体，狼狈败回沟底，而我方仅有20余名轻伤。

1942年初，敌人开始了对晋西北为时一年的大规模“扫荡”，妄想把晋西北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彻底摧毁。此时正值晋西北地区连年灾荒，抗日军民的处境极其困难。工卫旅在党的领导下，与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克服各种困难，狠狠地打击敌人。1942年5月，全部消灭日寇村川大队；8月，配合120师一个团在兴县田家会全歼1000多名鬼子，仅一个大佐只身逃窜；随后，接连进行了榆林、横山、王元池、野猪岭等战斗，截击敌人运输车，断绝敌军供给，给日寇以沉重打击；1943年8月，与120师一部配合在兴县甄家庄消灭由兴县向岚县逃窜的敌人800多名。

在近两年残酷的反“扫荡”中，工卫旅几乎没有一天不和敌人战斗。当时部队的粮食供给，除了缴获敌人的一些之外，主要靠黑豆、野菜充饥，经常是饿着肚子、光着脚板，和具有精锐装备的鬼子搏斗。但是，战士们自始至终保持着高涨的战斗情绪，为粉碎敌人对晋西北根据地的“扫荡”立了大功。

张兴业回忆 张政宏整理

想。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晋阳》一诗独特的思想艺术风貌。

何乔新在创作《晋阳》时，其心态应是复杂而深沉的。一方面，他对晋国的辉煌历史充满了敬仰与怀念；另一方面，他又对现实的荒凉与破败感到深深的忧虑与无奈。这种情感交织在诗人的心中，使得他在创作中既展现了对历史的缅怀，又表达了对现实的深刻反思。同时，何乔新作为一位政治家，他的诗歌中也不乏对政治理想和现实困境的关照，这种关照使得他的诗歌具有了一种超越个人情感的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诗意图
张璐



(44)

在晋东南多个古村落里，散落着众多明清至20世纪初的石碑，碑文上面记载的是对桑柿之业的叮嘱和教诲。凭借这些碑刻，我们得以窥见太行先民如何将桑与柿视为关乎生计的根本。

桑柿之重

桑与柿在太行先民眼里，绝非寻常草木可比。“尝思文王（周文王姬昌）有墙下植桑之政，昌黎（韩愈）有红叶成阴之诗，是知古昔植物非一，唯桑柿为最”，清同治四年（1865）泽州铺头村的《栽桑栽柿并禁砍伐碑》一语道出了桑柿在乡民心中的分量。

蚕桑业为百姓衣食之本，泽州的一通碑刻写道：“夫植桑养蚕……卖茧得钱，足够完粮纳课之需，其利亦何普哉！”蚕丝收入是农户完成国家赋税、维系家庭运转的重要现金来源，“所谓仰事俯畜皆出于此”。清道光十四年（1834）高平义庄村的《永禁桑羊壁记》中更是强调“农桑兼务，农食丰足”，将桑蚕业视为与粮食生产同等重要的生存保障。柿，是对桑的重要补充，亦有支撑“村人衣食之用”的功用。“秋时能供小儿以急食，夏日亦不畏炎蒸之逼人太甚”，乡民们用朴素的语言传达出对柿的偏爱。

桑柿栽种不择良田，“无论平原阪田”，田埂地角皆可生长，以其强韧的生命力成为村民谋生致富的不二之选。泽州口则村“山瘠薄田，获利无几，庶民困穷，实不可言”，在种植桑柿后，村里各户“以获微利”，一度“家给人足”。无独有偶，李山村也在“旷野荒庄，山多田少”的艰苦环境下，凭借桑柿成林，实现了“村妇殷实”。

桑柿的生态价值也被太行先民深刻体认。“近山者以木为主，近河者以水为势，山水抱环，龙行古迹。”广栽桑柿，村庄树木葱茂，才得以“丁财两旺”“人杰地灵”；而胡乱砍伐，则会激怒“山灵”，为村庄招致灾祸。在太行先民看来，平地山川的桑株林木，作为“一局取用之资，一篇风脉之本”，关系着一地的长久兴旺和可持续发展，“不可轻于断丧者也”。

劝植之道

泽州一通碑刻开篇即声明：“圣祖仁皇帝（康熙）尝刊《耕织图》颁行中外，是以文武官僚俱有劝课之责……我辈身居草野，敢不永为凛遵哉。”将栽桑养蚕提升到奉行皇帝的层面。高平拥万村特别规定，“夏至冬至，请有学问者在万岁牌侧讲读圣谕”，以传达“农桑乃生民之本”的帝王训诫。儒家经典也常被反复援引，《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许多村庄即以此阐明明桑养民的根本道理。泽州渠头村《公议乡风十二劝》则借用《礼记·月令》“后妃齐戒，亲宗乡躬桑”的典故，强调“夫蚕桑为王政要务，古之后妃皆躬亲之，况庶民乎”，激励村民栽植。

沁水的《六里禁伐桑碑记》以治铁与蚕桑的对比，揭示桑业的长期价值：“夫以桑养蚕利也，以桑供铁，亦利也。然铁之利由于开矿，矿尽而利止；蚕之利主于作茧，茧成而利长。”治铁虽能短期获利，但矿竭则利绝；而桑树“培植蚕桑者仍然无恙”，只要桑树常青，蚕茧便能“利长”，以至“世世永享太平之福”。泽州《史家庄社禁山碑记》则痛陈今昔之变：“昔吾村桑树成林，春秋获利之家实甚。迨后人心不古……随意伐卖……而利安在哉？”

不少地方还通过一系列制度化措施让劝植落到实处。高平《栽桑栽柿并禁砍伐碑》命令：“每亩栽桑树二株，柿树二株，只许加增，不许减少。”尤值得一提的是泽州义庄村的《永禁桑羊壁记》，其令全村各户上报田亩数量，在大社统一采买桑种后，“每一亩地发给桑种二枝”，通过“供给制”的方式解决贫民因经济困难而无力完成栽种任务的后顾之忧。

保护之法

为防止桑柿被无序放牧的牛羊啃食和人为的砍伐滥采，晋东南乡村还自发建立了一套包括禁令、处罚和巡查等内容的保护体系。

禁牧是首先被考虑的对象。高平定林寺的一通告示碑触目惊心地描述道：“大树则啮及平面，小树则拔其全株。”针对此，绝大多数村庄明确规定定了“禁桑”或“禁柿”范围，放羊的时间也根据农桑生长周期灵活把控。高平故关村曾规定“夏以三月朔日起至四月朔日止，秋以九月朔日起至十月朔日止”，在桑树发芽、春蚕饲养及秋粮成熟的关键期严防死守。

盗砍桑枝、柿条，甚至整树作柴薪或贩卖，是另一大祸患。泽州东掩村《乡约社首公议禁约》写道：“夫人之种植，良有深意，我欲得利，而使人徒劳，即人不我看，而风俗不由此坏耶？”盗砍盗伐被归结为一地风俗败坏的重要原因。对此，各村社的禁令同样斩钉截铁，强调“无论大家小户，均不许损折枝条”，如果有不遵者，被人拿获后，“报社公议罚，决不宽情”。

为了保证这套保护体系得以执行，各村还设立了监督机制，专设“巡夫”不时巡查，给予薪资。高平义庄村雇用巡夫的年薪是十二千文，在当时已是相当一笔巨款。若巡夫工作懈怠或以权谋私，纵放违规，轻则入庙议罚，重则“革退另觅”。

这些散落在晋东南一带记载桑柿之事的石碑，镌刻着太行先民在严苛自然环境中摸索出的生存密码，其背后蕴藏的是因地制宜、刚柔并济的治理智慧。



晋阳秋色寄风骨

耿璐

太山汾水旧山河，晋问朝残感慨多。
曲槛绿革陈薄蒿，秋田红稻藉余波。
遗灵尚眷徒林兜，瑞应空传异陇禾。
试问应韩今在否，荒城寂寞漫寒莎。

——何乔新《晋阳》

昔日巍峨的太山与奔流不息的汾水，共同见证了古老的晋阳山河。北宋时期，晋阳古城被一场大火烧毁。历史的沧桑与晋国的兴衰，让人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慨。看那曲折的栏杆旁，陈旧的薄雾显得略显凄美；秋天的田野上，红稻随风起伏，似乎在回忆着往昔河水的滋养。

明代诗人何乔新驻足于晋阳城，看到此情此景，用这样一首诗道出了复杂的思绪。

晋国的英灵虽已远去，但他们的事迹仍令人敬仰，如同孤独的犀牛在林间留下的深刻印记。然而，那些曾被视为吉祥之兆的奇异禾苗，如今也只是空留传说。试问当年那些英雄豪杰，如今又在何方？只留下这座荒凉的城池，孤零零地淹没在寒冷的沙土之中，显得格外寂寞……何乔新发此感慨。